

試論司馬遷的「多知」態度：司馬遷對秦的評價

(德國漢堡大學漢學系沙敦如講稿)

90年6月13日(星期三)，上午10:00中文系會議室

【(1) 前言：揚雄對於司馬談、司馬遷的責問】

漢代的哲學家揚雄在他的《法言》裏經常提到司馬遷，主要是批評他和他的著作。其中有一段簡短的，但滿有意思的對話，如下：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1]

根據揚雄的看法，像司馬遷、劉安這樣的人，不但是「多知」，甚至是「以多知」為「病」的人物了。好像揚雄認為他自己是醫生，司馬遷、劉安是生病的人。那麼，根據揚雄的看法，這種「病」如何可以治好呢？揚雄在這對話之下很清楚地表達什麼樣的藥能治療「多知」病：即是「勿雜也而已矣」[2]。「勿雜」，就是獨尊「經」的意思。「經」，這裏是獨尊孔子說的意思。揚雄的著作中，有效法《易經》的《太玄經》及效法《論語》的《法言》這兩部書。《法言》的目的是說明：假如孔子仍然存在這個世界裏，他對於當時的史事有什麼樣的態度。因為他主張史學家一定要根據孔子的學說評論史事，他反對司馬談、司馬遷提高老子的學說為準則，說：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曰：「可約解科。」[3]

好像修改司馬遷在《太史公書》裏主張的價值觀，成為揚雄的一個重要的任務。但他並不是一個史學家，而是一個哲學家。為什麼一部歷史著作中表達的價值觀對於揚雄會有那麼大的意義呢？他自己在《法言》的「自序」裏已回答這個問題：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 [4]

根據揚雄的看法，司馬遷紀春秋戰國時代至漢武帝之事，「不與聖人同」，意思就是說，假如孔子本身繼續他的春秋，用褒貶方法來判斷春秋戰國時代那段時間的事件，他不會像司馬遷一樣評論人物，評價事件。那麼，用秦為例子，揚雄認為聖人對於秦的興亡看法如何？當然，他自己認為能代表聖人的看法，因此參考《法言》裏對於秦的評論如何才知道揚雄認為孔子的看法如何。《法言》裏對於秦的評論並不少，主要

是在「重黎」篇，這裏只舉兩個小例子：

(1)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
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

(2) 或問：「〔...〕設秦得人，如何？」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

這兩個例子又是用對話的形式。第一個例子裏的問者想知道假如陳勝、吳廣兩個人沒有反對秦而起義的話，秦是否可以久治天下。揚雄的回答是很清楚的：按照他的看法，秦的失敗與陳勝、吳廣沒有關係。他的意思好像是，亡秦的因素是秦自己負責的，陳勝、吳廣的起義只是秦的錯誤的後果。

第二個問題更清楚：問者想知道秦統一天下之後，三代君主假如有好的顧問，秦也許能久治天下。揚雄對這個問題完全否定，說秦的失敗是要自己負責的，因此沒有人能幫助他了。

從這裏及《法言》裏其他處可看，按揚雄的看法，秦的君主都沒有受天命，因此也完全沒有坐上皇帝位子的權利。

司馬遷，那位「多知」的人，對於秦的看法不一樣。不過，在開始分析司馬遷的「多知」態度到底是什麼樣之前，要先了解一位不「多知」的學者——即是揚雄——的看法如何。值得注意的是：班彪、班固在著述《漢書》時，好像受到了揚雄的影響。班彪在他的「史記論」所宣稱的：「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又班固在「司馬遷傳贊」裏所評論「其是非頗繆於聖人」，都是與揚雄的判斷完全一致。至於班固如何評價秦的興亡，看得出來也是受到揚雄的影響。我這裏不能很具體地證明這個論點，因此只想舉兩個例子。第一：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
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5]

這個小對話，或者可以說，對於班固好像是一種口試，使班固在嚴格官員的眼前要明確表態。他藉這個機會表達他寫歷史並不是模仿司馬談、司馬遷的著名著作，而是採用新的辦法，新的價值觀來評論過去。他這裏發明的態度是：秦的治天下是完全不合法的。因此，無論秦統一天下後的君主人格如何，秦一定沒有辦法，沒有權利繼續治天下。這種態度與他父親班彪在他的「王命論」裏主張的看法一致：漢即是堯之後，主火德，根據「相生」說周主木德，漢因此主火德。[6]秦就沒有自己的德來主，因此用這種學說也是要證明秦是不正常，沒受天命的。

第二個例子表達得更清楚為甚麼在這個新的思想體系的基礎上班固一定要批評司馬遷和其他以前的學者的看法：

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

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鄙，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7]

班固讚揚秦的最後君主—子嬰—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強調秦到底是沒有辦法的，很像揚雄在《法言》裏說「秦喪其靈久矣」那樣。但他將賈誼和司馬遷都同樣對待，有點不公平。為了了解司馬遷的看法，先要很具體地區別：司馬遷評價秦時，他納入哪些文獻，在哪些方面接受又不接受前人的影響？意思就是說先要試試通過他的眼睛看過去的時間，然後才能了解他的評論辦法與評論目的。這個任務很不容易，這裏想試試很粗略地摘要地列舉一些對於他的價值觀好像有影響的因素，看他如何評價秦的興亡。

【（2）司馬遷評價秦時所列入的因素】

司馬遷判斷秦時，當然也是很嚴厲地批評它，不但批評統一天下自己稱帝的始皇及其後繼，而且批評秦在五百多年之發展中，最早在襄公始受周天子封時表現的態度。綜合起來地可以說他批評秦主要有三種「不應」，使秦有短期的成功，但長期來看使秦失敗。第一：秦進行的速度常常太快。第二：秦常常用太多力量，表現一種殘酷無情的心理狀態。第三，就是司馬遷所最強調的「不應」：秦一開始就傾向於僭妄。

先按每個「不應」看文獻舉一個例子：

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8]

這裏司馬遷將夏商周三代之興亡與秦國的發展作比較，推斷秦與三代興亡的大不同是夏商周都慢慢地發展，長期「積德」，而秦很快地吞併其他諸侯的封國而擴大，不「積德」而「積力」，司馬遷連用了一個很生動的比喻，將秦的發展與一個貪食的毛蟲作比較。

至於秦的殘酷無情的心理狀態，上面所稱引的「以蠶食六國」已引起了「少恩」的感覺了，而且司馬遷在《史記》裏多次提到秦的那個毛病，如：秦取天下多暴」[9]，在對照秦統一天下之前與統一天下之後時說：「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10]

第三個「不應」就是秦表達「僭妄」的態度。僭妄的責問，司馬遷首先是對始皇嬴政而發出的。在「秦始皇本紀」末他再次用貪食毛蟲的比喻，然後說：

[...]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

但是僭妄的責問又不局限於秦始皇，而也包括秦在統一天下之前那段時間。司馬遷幾次提到秦早在第一次被周天子封為諸侯後，馬上就祀祭上帝。他在「封禪書」具體地描寫，除了秦襄公以外，還有文公，宣公及靈公一共四代諸侯都作時祭祀：秦襄公作西時祀白帝，文公作鄜時祀白帝，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祀青帝，靈公作吳陽上時祀黃帝，

作下時祀炎帝。[11]判斷祀祭的事業稱它所謂僭妄，此在下面的章節有根據：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

以上提到的三個因素都可以稱為人的失誤，用漢代的術語，因為漢代的學者經常講到「天人之際」，也可以很簡短地說，上面三個因素都是司馬遷講到「人」的問題。下面就應講到「天」的問題，因為按照司馬遷的看法，好像「天」—就是命運—對於秦的興亡影響也是比較大的。

先看秦「興」，然後才看秦「亡」的問題。可注意的是，按司馬遷在「六國年表序」的推想，秦能夠統一天下成為「諸侯之雄」，因為他的條件不是很好的，不如其他當時的諸侯的那麼好，因此好像應是天想要秦能統一天下的。司馬遷寫：

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也，蓋若天所助焉。[12]

但分析秦「亡」的理由，司馬遷好像不敢判斷自秦的失敗至漢初，在這麼短的一段時間內，天命怎麼會三次落在不同的人物身上。他的懷疑好像也包括秦在始皇統一天下時，是否受天命的問題。這件事在「秦楚之際月表」可以看：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但是，如果老天會幫助秦統一天下，它後來為甚麼不要他作天子呢？也許，這裏有點矛盾，司馬遷自己沒辦法澄清。也許，司馬遷對於這個問題有他個人的看法，但這個看法不容易看得出來。為了比較能夠了解他的態度，要先看他對於其他所謂「天命」—即是說：依靠命運—的因素表達的看法如何。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學說就是鄒衍傳下來的「五德終始」說。司馬遷在《史記》裏多次提到這個學說，又在《孟子荀卿列傳》裏為鄒衍撰寫了一個小列傳。[13]看司馬遷在《封禪書》裏經常有像「其後百餘年」等等這樣的記錄，他似乎考慮，按照「五德終始」說，假如五百年之間應有聖王出，那麼秦自孝公至始皇那段時間的情況如何。[14]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就有如下的記錄：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15]

按照「五德終始」理論的「相勝」說周主火德，漢主土德，火土之中間應是水。但

是，認真地參考上面稱引的文獻，就看得見，司馬遷並不說秦始皇主水德。他只提到「或曰」——即是：有人說——，他好像有意地隱藏他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六國年表」裏，司馬遷又加幾句很奇怪的話說：

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

司馬遷這裏是否根據「五德終始」說推斷秦沒有辦法久治天下——可能他在這裏的意思是因為秦本來應有的德——水——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二世、子嬰在位時，已經快用完了。若是，則秦的失敗也是被一個不好的運氣而引起的。雖然這裏只是一個猜測，下面將提另外一個例子來證明司馬遷在評論秦興亡的問題比較強調命運的影響。

司馬遷在《史記》裏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預言。這個預言出於周太史儋之口。他在西元前 374 年自周去秦訪問秦獻公，讓他知道以下的預卜：

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16]

這個預卜的內容是甚麼？參考《史記》的「周本紀」，「秦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等等，就可以推斷：「始周與秦國合而別」，應提到周最早封非子的事。[17]「五百載」周與秦分開的那段時間應是自秦第一次封為諸侯（大概在西元前 770 年）[18]至周亡（大概在西元前 263 年）。[19]「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意思應是秦吞并了周之後，大概再過十七年秦始皇統一天下，自稱皇帝。[20]

自所謂命運因素的角度來看，太史儋的預言主要有兩個很有意思的內容：一個是周和秦將五百年而並行地存在：這好像暗示周封秦為諸侯以至託秦霸諸侯的史實。第二個是根據太史儋的預卜，秦將「出」的形式並不是當天子，而是當霸者！如上所述，司馬遷不只一次，而共四次提到了太史儋的預言。[21]其中一個進入了《老子韓非列傳》。在那篇中，稱引太史儋的預卜之後，再補充幾句滿有意思的話說：或曰儋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22]可注意的是，司馬遷不提出要把太史儋視為即是老子的主張，但他至少提到有人這樣猜測，似乎是因為他自己比較重視太史儋的預卜。此外，太史儋預卜裏所提到的周與秦再次合起來後「十七歲而霸王出」，對於司馬遷也應有特別的意義。

除了上面已講到的因素之外，當然還有其他的，比如：除了「五德終始」學說之外，他又按「三統」循環說來評論秦是否合法的，云：「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23]這裏司馬遷把「天」與「人」的因素並起來以便表達他對於秦的看法。此外，司馬遷幾次提到星座及異常的天象，主要是在「封禪書」裏，這裏只想舉一個例子：

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24]

「彗星見」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太史公在始皇登基以後十四年之內記錄四次見彗星，很清楚地表現天對於始皇如何治天下的態度。

綜合起來，司馬遷在評論秦的興亡事，包括了許多所謂「天」與「人」的因素。下面想摘要的是這些因素都是根據哪些傳統而提出的，司馬遷在評論秦受到哪些前人的影響。當然，這裏只能粗略地講述這個題目。

【(3) 司馬遷評價秦時所受到的影響】

要論司馬遷的所謂「多知」問題，首先要看他的父親司馬談的態度。司馬談對於司馬遷的影響當然是很大的。他當太史的時候，已經為了繼續孔子在

《春秋》表達的王道那個大事業而下了工夫，又託他的兒子在他去世之後一定要繼續他的大事業。這在《太史公自序》裏都講得很清楚：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自上面所稱引的文件看來，司馬談本身又包括兩種思想傳統。第一個是司馬氏祖先早在周代已作太史的傳統，第二個是想繼續孔子在《春秋》用褒貶方法來表達王者之道。這兩個傳統合在一起，也可以稱作是「天人之際」吧。第一個主要看天象，第二個主要看人事。下面要具體一點看這兩個思想傳統對於司馬遷的評論秦有甚麼影響：

按司馬談所提到的「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事：「太史公自序」第一段已有「司馬氏世典周史」[\[25\]](#)這句話。司馬遷在《史記》幾次所提到的周太史儋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他自己的祖先早已擔任太史的任務。

按司馬談上面又提到的「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事：在「太史公自序」共兩次提到這個問題。第二次是：「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26\]](#)。兩個引語，雖然內容稍微不一樣，但都是來自孟子的「五百歲必有聖人出」的論說。因為「五百歲」之學說與「五德終始」的學說之間的關係很密切，可以看出司馬遷按照「終始五德」說評論秦是否合法地主「水」德的問題，也應是在父親的指導下而論的。

至於「天」的因素，綜合起來可以說司馬談對於兒子的影響一定是很大的。而就在這，司馬遷在「太史公序」裏強調他和父親的看法並不是完全一致的。他說：「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27\]](#)為什麼司馬遷這個孝順兒子說他爸爸「不治民」？原因也許是因為他本人不大重視「天官」的事，而重視「人事」。

其實，司馬談對於「治民」的問題好像考慮得很深。他在《六家之要指》論文裏提出一個很有個性的價值觀。他的基礎雖然是道家，但是他自陰陽家，儒家，墨家，法家及名家都採取各家的優點來創造一個新的準則，這就是所謂「自成一家」的意思，也應是班固在「司馬遷傳」的贊裏所稱謂「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28]班固雖然是批評司馬遷的，但是實際上應是批評司馬談的《六家之要指》裏所提出的價值。

司馬遷強調他父親「不治民」的原因可能是來說明他本人對天子怎麼應治民的看法與他父親的不一致。再次想看牠對於秦的興亡表達的態度。上面所列舉的三種「不應」，即是秦（1）速度常常太快，（2）常常用太多力，與（3）一開始就傾向於僭妄：自司馬談的《六家之要指》裏提出的價值之角度來看，雖然批評的大要是一致的，但不是那麼具體的。想像在司馬談宣揚的價值的基礎上作天子的人應是安安靜靜地坐在寶座上，無為而無不為。他不會像秦的君主的那樣「少恩」，這即是對於法家的最大的批評點。但司馬遷論秦的時候，不限於那樣一種理想性的觀點。他動用了很具體的因素來評論秦，比父親好像實際多了。

能進行這種實用性的分析，司馬遷好像受到其他學者的影響。按我們在這個學期的分析結果，司馬遷在評論秦的時候，特別是受到兩個學者的影響，但與他們也又有不同：即是陸賈與賈誼兩位。下面先想簡介陸賈對於秦的主要評論，後簡介賈誼的與司馬遷相同與不相同的地方。

司馬遷是看過陸賈的《新語》，這自《史記》裏有關陸賈的列傳而可知的。列傳末的「太史公曰」有：

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29]

同列傳說明陸賈寫《新語》的原因即是用秦如何失去了天下事來教訓漢高祖。自陸賈所傳下來著名的那句話：「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就是用秦為警告的例子。陸賈對高祖說：「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30]這句話特別有意思，因為，像上面所已提到，班固批評賈誼、司馬遷最毫不留情地批判的原因即是因為他們並不認為天是完全拒絕秦德，而宣稱秦是因為自己的君主的態度不對而失敗的。班固卻沒有提到在賈誼之前的時代已有人這樣說。此外，我們下面將看到，他將賈誼和司馬遷都同樣對待，又是不準確的。但可以說的是，陸賈、賈誼、司馬遷三個人都不說秦一開始就是不合法的。

在《新語》裏陸賈把他對於秦的看法表明得很清楚。他說：

秦始皇設刑罰，為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天下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舉措太眾、刑罰太極故也。^[31]

值得注意的是分析秦的「少恩」態度，陸賈的看法是在事件發生不久後而表達的。司馬談，司馬遷宣揚「無為而無不為」的治國態度，反對殘酷無情的心理狀態，他們受到陸賈的影響是很可能的。

參考賈誼的列傳，《史記》、《漢書》都提到賈誼促請文帝要跟著「五德終始」說的循環而改正朔。《史記》裏有：

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32]

自賈誼勸說漢文帝按「五德終始說」改曆，可看出無論秦的錯誤多大，他還是確認它本來是正常受天命的。根據他的《過秦論》，他確認秦是有天子的：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凌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33]

自確認秦原則上是受天命的角度來看，司馬遷一定受到了賈誼的影響。但是，他們兩人的態度還是要很具體地區分。上面已提到，班固在那位嚴格的官員眼前批評司馬遷的時候，他將兩人同樣對待：

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34]

先要檢查賈誼的《過秦論》實際上寫的是甚麼？他共兩次表達他的「假使」的希望，不但及於子嬰，而且也是及於二世：

(1) 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35]

(2) 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36]

但是就在這裏，自秦的自然邊界、客觀情況的角度來看，司馬遷與賈誼有對立的看法。再次看看司馬遷在「六國年表」的前言裏表達的觀點如何：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也，蓋若天所助焉。[37]

當然，司馬遷的看法比賈誼的還應遭到班固的嚴厲的批評。因為他不但說，在固定的條件下，秦也許能繼續治天下，而且他認為環境因素都不特別利於秦，因此不得不是

天幫助它的。這裏好像是司馬遷在賈誼的《過秦論》的基礎上再進了一步，這就是說「自成一家」。

【(4) 小結論】

司馬遷在評論秦的時候，他不只自一個角度來看，而包括很多不同的因素。綜合起來地說，司馬遷好像最傾向於如下的看法：秦雖然自「五德終始」學說來看，本來應主水德而會受天命的。但是在一方面有周太史儋的預告說秦在五百年度之間都沒辦法獨立當天子治天下，只有在周的指導下，秦有為諸侯的霸主的權利。但是，雖然秦自霸者的角度來看，條件都是不錯的，但是秦的君主一開始而犯了很嚴重的錯誤，因此秦完全錯失了它的機會。這好像就是司馬遷由秦所得的教訓。

當然，揚雄所稱謂司馬遷的態度「多知」是沒錯的，但責問他說他「病以多知」不是也有點過分？相反地，也可以這樣思考：能夠純正地根據一個準則而判斷事件，會有誰呢？歷史並不是一件能「客觀」地所知的，而是由很多個體主觀地評論它而組成的事。揚雄那個人真的會「勿雜」而判斷往事嗎？檢查揚雄的個性，就應知道他本身也不是專門而獨「尊經」的一個人物。他除了撰寫效法孔子《論語》的《法言》，效法《易經》的《太玄經》之外，在青年時代他寫的賦也已引起人家批評。這豈不是應該稱他也是一個「多知」的人？

[1]見《法言》「問神」。

[2]見《法言》「問神」。

[3]見《法言》「寡見」。揚雄這裏所批評的，實際上不是司馬遷而司馬談所撰寫的《六家之要指》裏主張的看法。此外，揚雄提到的所謂「五經」，司馬談並沒提到。他的論文只有「六藝」而已。自這個角度來看，揚雄責問司馬遷有點不公平。I 見《史記》「太史公自序」。

[4]見《漢書》「揚雄傳」。

[5]見文選《班固「典引序」》

[6]所謂「相生」學說已由劉向父子用來宣揚王莽的「新」朝。另外一種，所謂「相勝」學說，主張朝代依五行相剋的次序循環。

[7]明帝永平十七年詔問司馬遷、賈誼評論秦之得失是否得當，班固除上表陳答外，別著此篇，後人取其注附之《史記·秦始皇本紀》末。見中華書局 6、290-93（值得注意的是班固補充文子的字體和正文的字體一樣大。）本文所引用的以下都是按中華書局（北京，1997年）。

[8]見《史記》「秦楚之際月表」。

[9]見《史記》「六國年表」。

[10]見《史記》「高祖本紀贊」。

[11]見《史記》28・1358, 1360, 1364。司馬遷在「秦本紀」也提到襄公，文公及宣公作時，但此不提到靈公事。在「秦始皇本紀」末的秦君主紀年表裏只提到襄公作時事。

[12]《史記》15・685。

[13]鄒衍的列傳在《孟子荀卿列傳》裏有，是在孟軻的列傳後附上的。見《史記》74。

[14]關於司馬遷在封禪書裏檢查秦的發展，參考史記28・1358-1366。

[15]史記28・1366。夏得木德，商得金德，周得火德的解說最早見於《呂氏春秋》，但沒有提到誰主水德。

[16]見《史記》4・159「周本紀」。

[17]見《史記》5・177。

[18]參考《史記》14・532。

[19]見《史記》5。1218。正文有：「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這應當西元前263年。又參考《史記》15-751。自西元前246年以後，秦取代周排在年表的首列上。

[20]當然，這種預卜的含義有幾種不同的解釋。我這裏主要採用司馬貞的解釋。《索引》有：「周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號曰秦嬴，是始合也。及秦襄公始列為諸侯，是別之也。自秦列為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三十六城以入於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五百」，舉其大數。《索引》又按：「霸王，謂始皇也。自周以邑入秦，至始皇初立，政由太后、嫪毐，至九年誅毐，正十七年。」見《史記》4・159。

[21]見《史記》5・201「秦本紀」，《史記》28・1364「封禪書」。再見《史記》63・2142「老子韓非子列傳」。《漢書》25A・1199-1200「郊祀志」都將「十七」代為「七十」。又王叔岷在他的《史記校證》解釋「十」與「七」在漢簡上寫的這兩個文字的字體是容易弄錯了。見氏著《史記校證》，第一冊，「代序」第5頁。

[22]《史記》63・2142。

[23]《史記》9・393-4。

[24] 《史記》 27 · 1348。

[25] 《史記》 130 · 3285。

[26] 《史記》 130 · 3296。

[27] 《史記》 130 · 3293。可注意的也是司馬遷如何描寫他父親的教育背景。「太史公自序」云：「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見《史記》 130 · 3288。

[28] 《漢書》 62 · 2738。

[29] 《史記》 97 · 2705（酈生陸賈列傳）。

[30] 《史記》 97 · 2699。

[31] 《新語》「無為第四」。

[32] 《史記》 84 · 2492〈屈原賈生列傳〉。班固在賈誼的列傳裏共兩次提到賈誼主張漢要主土德。見《漢書》 48 · 2222 及班固贊：《漢書》 48 · 2265。

[33] 賈誼《新書》「過秦論」中。

[34] 見本文第三頁。

[35] 《新書》「過秦上」。

[36] 《新書》「過秦中」。

[37] 《史記》 15 · 685。